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诚信：诚以养德 信以立身

蒲宏凌



① 内诚于心，外信于人

早在先秦时期，诚信的观念就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充分讨论。据《逸周书》记载：“父子之间观其孝慈，兄弟之间观其和友，君臣之间观其惠忠，乡党之间观其信诚。”此处“信诚”，意同“诚信”。邻里乡党之间的交往，需要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，真诚相待，讲求信用。《周易》也说：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进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”君子的修身之道，也离不开“诚信”二字。

诚于中，信于外。在传统的哲学思辨中，诚与信既是相关的范畴，又有不同的内涵。简单来说，诚，关注内在自觉，是内圣之道；信，注重外在实践，是外王之道。诚信作为道德规范，实则合乎内圣外王的哲学理路。

先来看“诚”。《大学》提出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条目，又反复论说，“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”“意诚而后心正”，而正心诚意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。在这里，诚是修养方法。同时，诚又是道德境界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。”又说：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”儒家认为，人道本于天道，只要努力追求诚的境界，上合天心，进而就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孟子也说：“是故诚者天之道也，思诚者人之道也。”又说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。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”与天地同参，与万物同体，这正是儒者所孜孜以求的精神境界。

再来看“信”。“信”往往着眼于人际交往中的重诺守信。《尚书》说：“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。”《诗经》说：“慎尔言也，谓尔不信。”这两句都是说言而有信，取信于人。孔子教授学生，有“文、行、忠、信”四教，要求“与朋友交则信”。《论语》中多次提到关于“信”的教诲，比如“敬事而信”“谨而信”“主忠信”“朋友信之”“信以成之”“信则人任焉”“信则民任焉”等。董仲舒认为：“竭遇写情，不饰其过，所以为信也。”他将信与仁、义、礼、智并列为“五常”，既是行为规范，又是道德准则，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。

② 不信不立，不诚不行

那么，何为诚信？古人认为，诚、信二字可以互训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信，诚也。从人从言。”又说：“诚，信也。从言从成。”《白虎通》也说：“信者，诚也。专一不移也。”诚信即是表里如一，言行如一。朱熹认为：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。”程颐认为：“以实之谓信。”诚信就是要诚实守信，重规则，守契约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

《管子》有云：“诚信者，天下之结也。”诚信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。《吕氏春秋》进一步论述说：“君臣不信，则百姓诽谤，社稷不宁；处官不信，则少不畏长，贵贱相轻；赏罚不信，则民易犯法，不可使令；交友不信，则离散郁怨，不能相亲；百工不信，则器械苦伪，丹漆染色不贞。”诚信缺失的危害极其严重，国家动荡不安，社会秩序混乱，经济凋敝，人人自危。孔子也认为，治理政事的要点在于“足食、足兵、民信之矣”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宁可去掉兵力和粮食，也不可失去人民的信任，否则国家也就立不起来了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诚信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。孔子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！”他又说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州里行乎哉？”

需要指出的是，诚信要以固执善道、止于至善为依归，否则就会走向固执己见、是非不分的反面行径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，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”又说：“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又说：“诚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诚乎身矣。”君子的进德修业之道，就在于择善固执，死守善道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孔子才说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。”孟子说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。”荀子也说：“君子养心莫善于诚，致诚则无它事矣，唯仁之为守，唯义之为行。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，儒家是一以贯之的。

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诚信建设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，不仅要弘扬传统的“诚信”美德，更要大力推进以个人为基础、企业为重点、政府为关键的现代“信用”建设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个人无信不立、企业无信不旺、政府无信不威、国家无信不强的观念，使现代诚信意识深入人心，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为规范。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，要倡导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，加强政务诚信、商务诚信、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。诚信中国的建设，要求每个人都将诚信作为言语行动的基本规范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贯彻和落实到实践层面，真正构建起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。

（作者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）
（本文配图来自网络）

葫芦上的雕刻艺术——访新疆工艺美术家马江红

本报记者 卢泽华

一间暗室、一排长桌、一把刻刀、一组展柜……来到新疆雕刻艺术家马江红的工作室，气候的炎热，城市的喧嚣，瞬间都被涤荡一空。

“从小到大都不敢想象我竟然与克孜尔壁画和葫芦雕刻结缘。”谈到自己这30多年的艺术生涯，马江红的脸上依然洋溢着热情。

马江红生于新疆，父母是当地的普通公务人员。在她的少年时代，马江红不顾父母反对，坚持选择了去新疆师范大学工艺与美术学院就读。马江红与壁画结缘源自大一那年她去敦煌实习的经历。“我被这些埋藏在沙漠里的艺术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尤其是那些色彩绚丽的线条和栩栩如生的故事。”马江红说。

后来，她又慕名去了克孜尔千佛洞。但这次的经历给马江红带来的却是失望和惋惜——这里的历史要比敦煌早200年，但经过数度劫掠和焚毁，佛洞里的古迹早已风化，几近消亡。

结束这次行程，马江红来到新疆喀什采风。此时，她看到一位雕刻葫芦的老艺人，这给马江红带来灵感——何不把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刻在葫芦上，让这两种艺术形式碰撞出新的火花？

马江红花了600元，买了一个大葫芦，在当时，这可谓是一笔巨款了。刚开始雕刻，她的小拇指常常被刻刀削得鲜血淋漓，但每次等伤好之后，马江红重新拿起刻刀，继续雕刻。

相对于平坦的纸面和墙壁，葫芦不规则的流线形体和弧面对行笔走刀构成了相当难度。为了丰富和完善艺术技巧，马江红先后到北京、扬州等地学习版画、木刻，玉雕等传统技法，并很快将它们融入到葫芦雕刻里。

马江红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佛教洞窟壁画，其中，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对她影响最深。为恢复这些濒临失传的壁画，她大量收集各国所藏的克孜尔壁画图片。同时，马江红并不满足于简单临摹这些壁画。“一味地临摹没有意义，每一件葫芦都应是创新的艺术作品。”马江红说。

在马江红的心里，一直存在着一个遗憾。

这还要从8年前说起。2008年，马江红带着她的14件作品来到北京798艺术区举办展览。在展览上，一位收藏家提出购买她的这些作品。当时的马江红正苦于没钱采购专门用以雕刻的油葫芦，于是，虽然不舍，她还是答应对方的请求。

卖掉葫芦之后，马江红立刻就后悔了。后来又花了几年时间把这些葫芦重新创作了一遍。自此，马江红没再卖过一个葫芦。事实上，在如今的工艺品市场上，这些葫芦每件都价值不菲，但马江红始终不为所动。如今，虽然生活条件有限，但马江红也过得十分惬意。

不过，马江红也有自己的烦恼。

一直以来，她都想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，合作开一家博物馆，来展示这些葫芦及其承载的文化。然而，不善交际的她始终没有为这个“博物馆计划”寻得合适的伙伴。同时，马江红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手艺失传，她想寻找一个可以承袭衣钵的弟子，但目前也没有任何音信。

“对于葫芦雕刻，我正在寻觅有心学习、能够坚守的传承之人。如果有缘相遇，我会不忘初心，把毕生所学传授给他。”说到这里，马江红充满希望的眼神里夹杂着一丝落寞。



马江红在创作中

□ 汉字故事

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——“峰”字暗藏康熙寻父秘密？

杨立新

2000年五一“黄金周”，单位组织我们去山西五台山旅游。沿着108级陡峭的石阶，我登上了位于灵鹫峰上的菩萨顶，只见迎面一座三门四柱七檐的木牌楼上，悬挂着“灵峰胜境”四个蓝底鎏金大字匾额。



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

由匾额上方镌刻的“康熙御笔之宝”玺印可知，“灵峰胜境”四字为康熙皇帝所题。其中“峰”字的写法与现行汉字有所不同，一是变左右结构为上下结构，写成了“峯”；二是“峯”字下部的“丰”，由三横变成了两横。

在现代汉字规范化之前，一些左右结构的汉字通

常可以写成上下结构。诸如：概—槩、胸—胷、期—朞、稿—藁、略—畧、毗—毘、棋—棊、群—羣、裙—裯、嘶—晷、毗—晷，等等。“峰”字写成“峯”即属此例。但尤让人困惑不解的是，“峯”字下部的“丰”，不知为何少写了一横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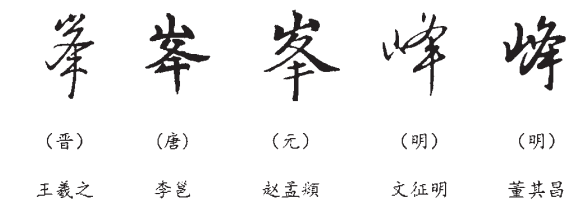
导游向我们介绍说，“峯”字少写一横，这是康熙爷在五台山有意留下的错字。说起这个错字还与一段重大历史事件有关呢，那就是“清宫四大疑案”之一的顺治出家之谜。

接着，导游绘声绘色地讲解起来：顺治皇帝在他24岁那年便驾崩了，宫里传出的消息是死于天花，而民间却另有说法，认为顺治为情所困，到五台山出家当和尚去了。一次，康熙借来五台山拜佛为名，悄悄打听父皇下落，当行到灵鹫峰菩萨顶附近时，遇到一位仪表非凡的僧人。康熙便上前与他打招呼，僧人自称名叫“八义”。下山后，康熙反复念叨着“八义”，猛然醒悟：“父”字拆开，不就是“八义”么？原来自己遇见的那个僧人就是父皇啊！康熙赶紧上山寻父，但“八义”却不见了踪影。康熙甚感失落，故而在题写“灵峰胜境”时，有意将“峯”字下面的“丰”少

写了一横，寓意为“父子缘薄不相识，人生有憾难圆满”。

应该说，这段康熙寻父的故事的确很感人，但明显系好事者附会编造出来的。由匾额的款识我们知道，康熙题匾时间为甲戌年仲夏，即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此时距康熙1667年亲政已过去了27年。康熙时隔27年再去寻父，显然与情理不合。事实是，从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年）起，康熙皇帝先后5次巡幸五台山，瞻谒文殊圣像，赐题碑文匾额，把五台山佛教当成了怀柔蒙、藏等民族的工具，以达到安定统一的目的。另据史学家们精心考证，顺治皇帝确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正月初七死于天花。再者，康熙所题的“峯”字根本就不是什么错字。

其实，古人在书写“峰”字时，下部的“丰”既可写成三横，也可写成两横（见下图）。如《圣教序》中王羲之写的两个“峰”字均为两横；康熙的书法受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的影响很大，董其昌的“峰”字也是这样写的。



那么，“峰”字为何可以写成两横？由下面“峰”的字形演变可以看出，在甲骨文、金文中，“峰”字都是两横，甲骨文竖画下有一圆点；到了小篆才演化为三横。因此，这种两横的“峰”字可说是古文字的“子遗物种”。



另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，康熙御笔亲题的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“雷峰夕照”碑，其“峰”字的写法与五台山“灵峰胜境”匾额毫无二致。按照导游的上述逻辑，莫非康熙还曾到杭州寻父不成？看来，“峰”字这种写法完全是康熙个人的书写习惯，绝无任何深意可言，不可过度阐释。



杭州西湖“雷峰夕照”碑